



# 中日网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当前位置: 首页 > 研究专题 > 中日关系 > 论文

## 21世纪初叶中日关系发展主要影响因素分析与走势前瞻

发布时间: 2009-06-30 点击次数: 1066 作者: 吕增艳, 王红梅

摘要: 本世纪伊始接连发生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和东海油气田问题等, 使21世纪的中日关系开局不利, 其中, 日本的右倾政策和美国的遏制政策是制约中日关系走向良性发展轨道的两把双刃剑。从新世纪初期日本各届首相对华外交思路的分析可以推断, 21世纪的中日关系仍将不会一帆风顺。

关键词: 21世纪初期; 中日关系; 主因分析; 走势前瞻

基金项目: 本文系通化师范学院社会科学科研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200820

在描述中日关系时, 不可避免地经常地出现“政冷、经热、美国、台湾问题、右倾政策、经济强国、政治大国”等词汇, 而且在阐述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 这些词汇往往会充当关键词, 这说明在错综复杂的中日关系中, 在内部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和科技的等因素, 其中日本右倾政策是主因, 且党派之争不断, 新世纪以来, 日本“森派”执掌政权, 虽然目前的在野党没有对其构成威胁的力量, 但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 执政党推行的政治主张能否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 仍是一个未知数。在外部有全球性的、区域性的和第三国的……因素, 其中美国遏制政策是主因, 且日本在战后制定的美主日从的外交原则,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 一、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主因分析

#### 1. 内部因素: 日本右倾政策

日本右倾政策是日本少数右翼势力利用攫取的政治权力和大众的要强心理而推动制定的行动准则。在日本政治史上, 它萌芽于1957年的岸信介政府上台, 形成于1993年的自民党分裂, 发展于2001年的小泉政府上台, 加剧于2004年的小泉首相连任。在中日关系史上, 它萌芽于1977年的“光华寮问题”, 形成于1982年的“教科书事件”, 发展于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风波”加剧于2001年的“教科书事件”。究其实质, 主要在于日本政坛混沌, 具体包括: 一是为侵略历史翻案; 二是妄图修改和平宪法, 废除宪法第九条; 三是妄图走向军事大国。[1] 315-322究其根源, 是对军国主义清算极不彻底; 二是神道教和天皇神国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 三是日本未能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 四是冷战后东亚战略形势的变化造成了相应国际环境。

[1] 315-322究其影响, 主要是作用于东亚政治, 具体包括: 一是增加了日本未来政治走向的变数, 危及东亚安全; 这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东亚国家的警惕和不信任, 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特别是其对21世纪的中日关系之消极影响[2] 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是历史问题。中国解决历史问题的根本方针是“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而日本更多地强调“结束过去, 开创未来”的重要性。这成为引发两国摩擦的一个根源。首先, 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 小泉自2001年上任以来先后六次参拜靖国神社, 不仅对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的愤怒和抗议漠然置之, 甚至攻击中方的严正交涉为“干涉日本内政”。为此, 中日首脑互访中断数年, 中日关系曾降到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点。而且, 小泉的后任安倍, 在未上任之前就制造事端, 就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投石问路, 大大伤害了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其次是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文部科学省不顾中韩等国的强烈反对, 批准扶桑社歪曲历史的右翼教科书出版。而一些阁僚则不断发表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论, 并呈越演越烈之势。

二是台湾问题。近年来, 日本提升对台关系, 批评中国反“台独”斗争, (1996年中国开展反台独斗

争，进行导弹演习，日本对此表示“抗议”，成为亚洲国家中唯一公开偏袒台湾的国家）与美国全面加强军事同盟关系并联合研发TMD（实际上将台湾包括在其同盟条约的覆盖范围内），台湾问题重新凸显，并开始溢出政治问题的范围与安全问题相联系，成为中日之间在政治、安全两大问题上的共同摩擦点。90年代末，在台湾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1999年李登辉公开提出“两国论”，2000年坚持台独党纲的民进党上台。）日本政府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摩擦一度有所和缓。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摩擦再度加剧。2001年、2004年，不顾中国强烈反对，日本两次同意“台独”势力头面人物李登辉访日。与此同时，日本进一步提升对台关系，公开或秘密地加强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和军事关系。2005年春，日本追随美国，以有损台海安全为由，明确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售。同年2月，日美又将台海安全列为“共同战略目标”，并于10月就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加强军事一体化达成新的协议。日本的这些做法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加深了中国对日本走向的疑虑。而且，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对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往往比对美国更敏感，反映更强烈。这不仅是因为日本有侵占台湾的历史，日本与“台独”势力的发端有历史渊源，而且还有地缘政治上的原因（日本的一些政治势力认为，如果大陆与台湾实现统一，不仅将使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大大增强，而且将使日本在的海上交通线为中国所控制，因而对日本十分不利；只有长期保持海峡两岸“不战不和”的状态，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这种战略考虑虽未见诸日本公开表述的官方政策，但在日本研究机构的报告及日本右翼的宣传中屡见不鲜。）许多中国人认为，即使有一天美国愿意接受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日本也难以接受。

三是领土问题。钓鱼岛问题是涉及中日主权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政府主张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虽然至今仍在日本实际控制之下，但中国从未放弃对其拥有主权的立场。日本则认为，近代以来日本一直拥有对该岛的主权和控制权，否认中日存在领土之争。四是军事问题。在日美安保体制中，日本首次将“周边事态”纳入防卫范围，实际上圈定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地理范围，给中日关系蒙上一层浓厚的阴影。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右倾政策并非中日复交以来外交政策的全部，只是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倾向因素。中日复交以来，日本外交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一是“多边自主外交”时期（1972-1976）。核心是因应尼克松访华这一“越顶外交”之举，强调以美日协调为基点和以中日复交为首要；二是“全方位外交”时期（1976-1978）核心是顺应国际形势缓和，强调以美日合作为轴心和以协调与联合为导向；三是“大国外交”时期（1978-1990）。核心是强调以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和科技等手段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威胁，实现综合安全保障，同时强调以综合力量“为世界做贡献”，在亚太地区掌握主动权；四是“新秩序外交”时期（1990-）。核心是在强调保障和平安全、尊重自由与民主、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确保世界繁荣、确保人类生活理想的环境和必须争取以对话协调为基础建立稳定的国际关系的同时，重点进行“联合国中心主义外交”，并且为摆脱战败国的不利地位而谋求取消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2]无可否认，抛开其中的右倾成份，日本外交政策还有许多积极或合理的成份。

## 2.外部因素：美国的遏制政策

中日关系受到中美日三边关系中另外两对关系，即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深刻影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其中，以日美安全条约为载体的日美军事同盟是问题的关键。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曾郑重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3]在联合声明之外，时任外务大臣的大平正芳又专门以谈话的方式向国际社会表明，日美安全条约是不针对中国的。但是，时隔24年之后，全球冷战已宣布结束之时，日美又于1996年重新定义了军事同盟，1997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1999年日本国会又通过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等“周边事态法”的三个相关法案，并且把台湾纳入日本《周边事态法》的适用范围内。通过这些措施，原称不针对中国的日美军事同盟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这其中当然反映了美国在冷战后重新调整其亚洲军事部署的考虑，但也不能不看到日美两国遏制中国、插手台湾问题的真实意图。随着“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国内的高涨，联合美国防范和围堵中国成为日本领导集团的重要战略考虑。以中国为假想敌调整军事部署以及利用日本海上自卫队联合美国驻军对付中国都是这一战略的具体表现。

尽管双方联合遏制中国的态势不可逆转，但日美同盟“美主日从”的框架也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的，日本在其中既受益于美国的保护与扶持，同时也受到美国的控制与压力。在战略上，美国力图维持“美主日从”框架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增加对美合作，日本则力图利用美国的要求和压力不断提高自己的“对等伙伴”地位。

近年来，日本媒体纷纷对日美关系“步入深秋”、美中关系日益升温表示担忧。2007年11月26日，《朝日新闻》以二战时中美联手打败日本为例，从历史角度阐述了对中美接近的焦虑。《外交论坛》2007年11月号刊登一篇题为《美国对日本失去了兴趣？》的文章，其中认为，美国正与日本渐行渐远，美国智库没有日本研究者，对中国的兴趣反而越来越浓，“今后美国既要保持日美同盟，也要和中国一道封锁日本”。据2007年11月25日《读卖新闻》报道，近年来英国的日本研究所机构变得越来越少，中国研究机构持续增多；派驻日本的外国记者人数已从1991年的515人减至目前的275人，外国报道机关也由337家减至201家，而派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人数则由2003年的380人猛增至2007年的705人，报道机关由214家增至351家。2007年11-12月间公布的各种民调结果显示，日本人对美国的好感度下降，对中国的好感度上升。

面对中日两国国际影响逆转的趋势，日本各界精英正纷纷提出各种对应方案。其中，不乏以“价值观外交”对中国实行意识形态包围的呼声。但有的专家则主张“必须把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和构筑与亚洲良好关系作为21世纪日本外交的两个轮子”，“日中两国应当承担起东亚共同主席的责任”。[4] 中日战略关系存在这样一个死结：一方面，日本之所以迟迟不能摆脱“美主日从”框架，就是因为是在日美同盟问题上未能让中国安心。其实，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障碍不在中国，而在于对美依赖，原因也不在中国，而在于日本在历史与现实问题上未能实现日中战略和解。对日本而言，如何为21世纪的对美、对亚外交定位，特别是如何为对美、对华外交定位，将是通过分析能够得到预测的问题。

## 二、中日关系发展走势前瞻

如前文所述，在国内外因素的压力和影响下，中日关系的发展注定不会一帆风顺，那么，21世纪的中日关系发展的主线究竟怎样？笔者拟从新世纪以来日本对华政策中寻找端倪，进行分析：

2005年10月31日，小泉改组内阁。一直主张对外持强硬态度并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新生代政治家”安倍晋三次入内阁就被任命为外务大臣，同样支持参拜靖国神社的麻生太郎则出任外务大臣，本届小泉内阁的主要成员均属于支持参拜靖国神社的“鹰派”人物。上述人事安排预示着小泉的后续政权仍将继承小泉的既定路线，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安倍内阁的对华“两面下注”战略和“价值观外交”，给日本的“亚洲外交”蒙上了阴影。安倍采取对华“两面下注”战略，虽然强调中日是“战略互惠关系”，但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模糊的姿态，在台湾、领土与海域等核心利益问题上态度强硬，给中日关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冲击。因此，安倍很难在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实质性问题有所突破。福田内阁时期（2007年11月15~17日），福田首相在与布什总统会谈时提出了“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的共鸣”这一新理念。福田在任的一年内，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建立了中日领导人的政治互信；（2）推动了两国重要问题的解决，譬如在东海问题上达成了原则共识；（3）推动了两国在重要领域对话的进展，譬如能源、环保及地区开放等问题上；（4）对于中日两国各自的核心利益开始彼此关注，譬如福田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就是对中国重要问题的关切；（5）对华姿态的改善促使中日战略转换器形势朝着软着陆，使两国民间一定程度存在的民族情绪有所缓解。福田辞职与对华政策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中日关系的发展符合日本的长远利益。不过，在日本国内一直有反对的声音，譬如日本右翼人士和强硬派人士，都对于福田的对话政策存在诸多批评。面对小泉、安倍内阁遗留下来的负面政治遗产，福田内阁也很难在长时间内有所作为。

在对华关系上，尽管日本的各届领导人都主张中日友好，但他们不会为此在政治理念和行为方式上做出妥协。例如被视为日本政界右翼政治家代表的小泽一郎，他也宣称自己是中日友好人士，并长期热心参加推动中日友好的“长城计划”但他始终坚持《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所说的“周边事态”理所当然地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归根结底，二战以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始终是围绕着日美合作的基轴做顺时针正向运动的，而且它的发展速度始终是在日美关系发展的后面，即便中日经济关系发展迅速，（目前，“在中国，约1000万人直接或间接为中日合资企业工作，日本外贸增长的50%来源于中国。这是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中日两国经济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局面”）[5] 但也始终摆脱不了美国因素架在中日关系发展中的“魔咒”；当然，抛却美国因素，就地缘政治的角度及更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角度上说，日中关系的发展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质的变化，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首先，中日两国不会出现战争，因为这既不符合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战略其次，中日关系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敏感问题的作用下，不可能出现彻底的改观，因为这是日本右翼势力所不允许的，而在当今的日本社会，自2000以后森喜朗执政至今，日本政坛几乎始终被对华强硬派“鹰派”所掌控，并得到从国会、财团到普通的国民的支持与拥护，“森派”的执政基础不容小觑。[6]

综上所述，无论从历史问题的纠葛还是从现实利益的冲突乃至日本国内政治的发展趋势来看，中日两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很难消除彼此间的矛盾和摩擦。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两国产生更大的对立冲突，首先

应充分利用政府间现有的各种对华磋商机制，加强彼此的沟通和谅解。同时进一步深化经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并继续扩大各阶层各领域的民间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应呼吁两国大众传媒特别是日本传媒在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良性作用，在两国人民之间架起相互理解的“桥梁”。在双方有严重分歧的历史问题上，应加强两国乃至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对话，推动历史问题的共同研究。作为中国政府，应加大对历史证据的挖掘、收集和保存工作，增强自身的说服力，并努力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对日本政府的错误言行施加更大的压力。

总之，无论双方是否愿意，中日两国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全球化的大趋势更使得两国的利益紧密交织在一起。“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双方必须理性地处理彼此的矛盾和分歧，求同存异，加强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 [1] 刘宗和.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M] //靳民生.国际安全与安全战略，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 [2] 吴康和.当代国际关系 [M]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
- [4] 五百旗?真.21世纪の対米?? [J] .美日新闻，2007-11-25.
- [5] 人民网.东亚合作有助中日破局' [EB/OL]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4323366.html>
- [6] 金熙德.森派执政时期日本政治与中日关系 [J] .和平与发展，2008（3）.

（作者简介：吕增艳，女，蒙古族，吉林镇赉人，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

本文转引自《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第30卷第3期 2009年3月 编辑：丁维伟）